

现代日本人中国观的变迁

——评马场公彦著《现代日本人的中国观》

诸葛蔚东

2014年5月,日本新曜社出版了马场公彦的《现代日本人的中国观》^①一书,该书对日本主要杂志涉及中国的报道、评述进行分析,同时就现代日本人中国观进行了细致的解读。该书研究视角独特,对理解现代日本人对中认知的形成和发展的逻辑、思考如何改善中日两国之间缺乏认同的现状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

《现代日本人的中国观》是马场公彦继2010年出版《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从日本战败到中日复交》^②之后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从日本战败到中日复交》中,作者就以《世界》《中央公论》《改造》《日本评论》《文艺春秋》和《现代》等日本24种综合性杂志发表的有关中国的2554篇文献进行了分析,对中日恢复邦交前日本人中国观的形成和变迁的脉络做了系统的梳理,勾勒出战后日本人中国观的形成和变迁的轮廓。作者认为,战后日本的中国观应在战后日本思想史的脉络中来把握。从战后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中国学研究者的主观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当时中国观的形成。

在《现代日本人的中国观》中,作者按照时间顺序,对1973年至1992年之间日本人的中国观的形成和变迁进行了梳理。其研究的具体方法是对《日本与日本人》《文艺春秋》《诸君》《自由》《中央公论》《世界》《潮》《朝日杂志》《现代》《思想的科学》《展望》《现代之眼》《正论》等日本杂志中的相关新闻报道和评述根据不同的主题进行归类,就其中的观点、倾向以及对决策和舆论的影响进行具体的分析。此外,作者还另辟专章就1945年至今日本人的台湾观和战后日本人的蒙古观进行了系统考察。最后,附有作者对五位中国问题专家采访的“证言编”。

二

对于现代日本人中国观的变化,作者在书中主要介绍如下。

^① 馬場公彦「現代日本人の中国像:日中国交正常化から天安門事件・天皇訪中まで」、新曜社、2014年。

^② 馬場公彦「戦後日本人の中国像:日本戦敗から文化大革命・日中復交まで」、新曜社、2010年。

第一,在1973年至1978年这一时段中,作者由对上述杂志的涉华报道所进行的分析得知,当时论及中国问题的作者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首先是研究现代中国问题的学者,其次是现任或曾任驻京记者,再次是来自台湾的作者,最后是以中国为创作素材的作家。值得关注的是,就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来说,其中可以分为支持“文革”的学者和持冷静观察态度的学者两种类型。但总的来说,当时中国问题研究的“主流是客观观察型现实主义学者”。^① 当时日本舆论和学界认为中国虽尚不具备进行充分改革开放的条件,但在民众中间已萌发了对改革开放的要求。与战后初期形成的日本的现代化以战败告终,而新中国的成立代表了新的社会变革方向的认识相比,这时日本舆论界的观点是“中国已不再是‘学习’的对象,而是‘观察’的对象”。^②

就中日恢复邦交等议题,作者指出,这一时期日本主要杂志发表的大多数有关中国的报道和评述,主要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进行分析,而不再一味从社会进步和意识形态的立场评价“文革”等新中国的社会改革运动。

第二,在1978年至1987年之间,随着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中日两国间的民间交流日趋频繁,认知不断深入,日本人对中国的亲近感逐渐上升。但在这期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中日恢复邦交后,随着对中认知机会的增多,日本人发现以前通过媒体和出版物形成的中国观并不完全等同于现实的中国。同时,日本人也意识到了中国社会的“异质性”。20世纪80年代初期,作者第一次访中时对过去在书本杂志上了解到的让人憧憬的中国大地和人们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在作者看来,“那紧皱双眉下营养不良的充血的凝视过来的眼睛”俨然是好奇的“外星人”。^③ 实际上,对满怀热情的作者来说,初次访中留下的是一种不悦的回忆。尤其出现了教科书事件等历史问题以后,两国之间的隔阂进一步扩大。

此外,受日本媒体对中越战争报道的影响,改变了曾热衷于中国社会主义建国理念的日本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他们对在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感到费解。

第三,在1988年至1990年和1991年至1992年这两个时段,日本人的中国观再度发生变化。尤其是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日本追随欧美国家也与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中日关系一度蒙上阴影。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日本开始重新认识中国,1992年日本天皇终于成功访问中国。但不能忽视的是,这一时期日本主要杂志的涉华报道表明,当时日本国内舆论的整体倾向是反对天皇访问中国的。“就天皇访问中国的是与非来说,左派杂志几乎都予以回避,《诸君》《文艺春秋》和《正论》等右派杂志在1992年9月至11月做了集中报道,在观点上几乎都是反对天皇访问中国”。^④

也就是说,尽管天皇访问了中国,但现代日本人的中国观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对华友好、亲近态度已完全不同。战后初期,自民党内部的亲中派不乏影响力,由于中日间“特殊的文化和历史渊源关系”,即使是首相吉田茂对于“不屈服于日本的中国也许都拥有亲近感和认同”。^⑤ 如今,日本人的中国观可以说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种转变在日本的出版物中表露无遗。2014年10月,日本出版了加藤直树等著的《向仇恨出版说不:出版者的责任》一书,该书认为日本出版界中出现的“厌韩厌中”现象应引起社会的关注,书中援引一项读者调查说明,日本一般读者认为日本书店中批评特定国家和民族的出版物“多”。作者认为出版业界要有社会责任,不应推波助澜,通过炒作等方式来追逐经济效益。^⑥

① 馬場公彦「現代日本人の中国像:日中国交正常化から天安門事件・天皇訪中まで」,35頁。

② 馬場公彦「現代日本人の中国像:日中国交正常化から天安門事件・天皇訪中まで」,36頁。

③ 馬場公彦「現代日本人の中国像:日中国交正常化から天安門事件・天皇訪中まで」,356頁。

④ 馬場公彦「現代日本人の中国像:日中国交正常化から天安門事件・天皇訪中まで」,150頁。

⑤ 若宮啓文「戦後70年 保守のアジア観」,朝日新聞出版,2014年,327頁。

⑥ 加藤直樹、明戸隆浩、神原元「NO-ヘイト! 出版の製造者責任を考える」,ころから出版,2014年,61頁。

三

“证言编”包括对若林正文、西村成雄、滨下武志、船桥洋一和毛里和子五位专家的访谈录,其中船桥洋一介绍的《朝日新闻》涉华报道框架的变化,可以说代表了现代日本人中国观的变化。

在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前后,《朝日新闻》的方针是“友好第一,采访第二”。当时《朝日新闻》所做的有关中国的报道都是“中日友好宣传报道活动”。^①1964年4月,在松村谦三访华时与中国商定双方互设贸易联络处,以推动两国间的贸易合作,并商定互换常驻记者。根据松村谦三和廖承志备忘录,在双方签订日中记者交换协定之后,日中各向对方派遣了8名报纸、电台和电视记者,从1964年10月1日起,《朝日新闻》开始在北京派驻记者,该报不再用“中共”的指称,开始使用“中国”的称谓。与同时进驻北京的日本其他媒体不同,《朝日新闻》的涉华报道有一个宗旨,那就是“以日中友好、恢复国交为使命的理念”。^②

就涉华报道来说,战后《朝日新闻》曾一度被认为是“亲中”的。《朝日新闻》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是持赞同态度的,其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赞许态度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1970年4月22日,《朝日新闻》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题为《访问中国之后》的报道,肯定文化大革命。该报道的执笔者是时任社长的广冈知男。当时广冈参加了自民党组织的访华团,这篇报道反映的是他对中国的实际观感。《朝日新闻》的这种涉华报道框架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随着国民意识和国内读者市场的变化,《朝日新闻》也开始面临巨大的挑战,为迎合读者和社会的需求,该报的涉华报道基调也已发生转变。如《朝日新闻》曾刊文称当今日本人的对中认知又回到了80年前:中国是一个“不遵守国际规则以自我为中心的国家”。这一印象“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中国印象是重叠和一致的”。当时,日本在日俄战争后获得了俄国对南满洲铁路等方面所拥有的权益,“争取归还主权的中国和以条约和法规为依据的日本发生了冲突”。当时日本媒体在指责中国时的理论是“中国不遵守国际条约和国际义务”。^③

著名学者毛里和子毫不掩饰其对2010年以后中日围绕钓鱼岛不断升级的冲突所感到的无能为力和失望的情绪,甚至“终止了从事半个世纪的中国研究,把与中国有关的资料和书籍放置起来,想转行做俄罗斯研究”。然而,不甘心的毛里教授后来还是成立了“日中关系研究会”^④,体现了日本学界对中日关系的迷茫情绪。

四

最后笔者想就《现代日本人的中国观》一书谈以下几点感想。

首先,中国问题可以说始终是日本政界、财界和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日本媒体也充满关于中国的议题。由于个人的立场和见解上的差异,日本人的中国观可以说非常复杂,且难以梳理。本书作者以战后日本主要杂志对中国的报道为素材,分析不同杂志的报道框架,并进行量化处理,在此基础上对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的形成和变迁过程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找出了其中的内在逻辑

① 馬場公彦「現代日本人の中国像:日中国交正常化から天安門事件・天皇訪中まで」,348頁。

② 粕谷一希「メディアの迷走-誇りなき報道が国を亡ぼす」,PHP研究所,1994年,174頁。

③ 塩倉裕「日中問題80年前に教訓」,「朝日新聞」,2012年11月14日。

④ 馬場公彦「現代日本人の中国像:日中国交正常化から天安門事件・天皇訪中まで」,373頁。

和轨迹,研究视角得当,选取的材料、得出的结论也颇具说服力。

其次,本书深入细致地分析了现代日本人中国观的形成和变化。如作者指出日本的“战败”和新中国的成立对战后日本人中国观形成的影响。尤其是在战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中国一度成为战后日本知识阶层“想象的异邦”,不少日本学者试图通过研究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路径来寻求日本社会的变革方向。

但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使日本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乃至人们的意识观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主义思想得以复兴。学界对日本社会与现代化问题也有了新的认识。以上可以说是本书的作者在第一章节中提出的“中国已不再是‘学习’的对象,而是‘观察’的对象”的社会和思想背景,这也是促使其后日本人的中国观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再次,在对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进行深入分析之后,作者并没有满足于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是就现实的解决提出了具体的方案。

作者认为中日两国之间的摩擦和相互不认同,在很大程度上起因于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的隔离状态和由此产生的误读。从日本战败到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中日间的交流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两国国民之间正常往来的历史也只有40年的时间。在这短时期的交往过程中,一旦对方发现“异质性”多于“同质性”就容易立即产生厌恶感,甚至一个毒饺子问题就会阻碍两国间的交流。这说明“两国之间的关系就像充满稚气的孩童的交往一样”,尚不成熟。就建立成年人的交往方式来说,仍需要扩大交流的数量、时间的积累和交流质量的深化。

为此,作为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作者就如何达成客观的对中认知提出了建设性的提议。如进行中日两国之间的民间外交研究,以促进民间交流和探求增进相互了解的途径,因为中日恢复邦交的最初的推动力就来自民间人士,民间外交也是打开中日相互误解最切实的管道。这一提案不仅可行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其具体的实施途径仍需通过社会各界的合作和努力来解决。

“证言编”收录的作者对若林正文、西村成雄、滨下武志、船桥洋一和毛里和子的专访,披露了当今日本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问题专家的治学经历。上述五位专家和学者在访谈中表达出来的多是尚未见诸文字的个人心得,在某种程度上更能透露出其从事中国研究的真实感受,有利于读者直窥其内心世界,是不可多得的研究素材,也具有格外重要的学术价值。

[作者诸葛蔚东,中国科学院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高莹莹)